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中介”范畴的当代价值与方法论研究

司雅心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摘要

中介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体现唯物辩证法精神的重要理论载体, 是事物实现普遍联系、矛盾转化与动态发展的关键环节。中介并非抽象的逻辑过渡形式, 而是贯穿自然、社会与思维领域的客观存在, 是破除形而上学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重要支撑。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矛盾关系日趋网络化的背景下, 中介范畴展现出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与更为鲜明的实践意义。系统阐释中介范畴的哲学基础、内在规定与体系地位, 深入挖掘其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方法论功能, 能够为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化解现实社会矛盾、推动实践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哲学支撑与科学的思维指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介范畴, 唯物辩证法, 矛盾转化, 方法论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 of the Category of “Med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Yaxin S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0, 2026; accepted: March 30,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Abstract

The category of mediation serves as a crucial theoretical vehicle embodying the spirit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ithin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system, acting as a pivotal link in the universal interconnection,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ings. Mediation is not merely

an abstract logical transitional form, but an objective reality permeating the realms of nature, society, and cognition. It provides essential support for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thinking patterns of metaphysic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social structures grow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contradictions become more networked, the category of mediation demonstrates richer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more pronounce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ic status, along 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methodological functions i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can offer solid philosoph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comprehending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resolving real-world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advanc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ategory of Mediati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Method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人类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中，如何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结方式、理解矛盾的转化机理、阐释世界的发展规律，始终是辩证思维关注的核心议题。近代以来，形而上学思维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视角看待客观世界，将对立范畴绝对化、将事物存在固化，不仅遮蔽了现实世界的复杂联系，也难以回应社会实践提出的各类理论与现实问题。德国古典哲学以辩证法为武器，打破了非此即彼的认知桎梏，其中介思想为理解事物的过渡性、关联性与过程性提供了重要思路，却因唯心主义立场而陷入逻辑与现实的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唯物主义实践观，对中介范畴进行了根本性重塑，使其从抽象的精神运动环节，转变为揭示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范畴。

进入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矛盾形态愈发多元、实践形式不断革新，数字技术重构交往中介、社会治理依赖制度中介、发展统筹需要协调中介，传统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愈发难以适配时代需求。在此背景下，中介作为连接主客体、贯通矛盾双方、支撑发展进程的关键环节，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被进一步凸显。系统梳理中介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规定，明晰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地位，剖析其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呈现与运行逻辑，挖掘其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中的方法论功能，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更能为化解复杂社会矛盾、推进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思维方法与理论支撑。

2. 中介范畴的理论溯源与内涵界定

中介作为哲学范畴，其理论形态最早形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黑格尔以唯心主义方式确立了中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中，中介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展开、自我过渡与自我回归的逻辑环节，是概念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必要桥梁。黑格尔强调，一切事物的运动与发展都必须依托中介环节得以实现，孤立、静止、直接的存在无法构成真实的运动过程，中介性体现着辩证法的联系性、过程性与整体性。这一思考打破了近代形而上学机械、片面、僵化的思维桎梏，为辩证思维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1]。

但黑格尔的中介理论建立在绝对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将中介运动归结为精神的自我演绎，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对中介范畴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使其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转变为解释现实世界的科学范畴。马克思从未将中介视为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而是将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结构与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结合，使中介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2]。在《资本论》的分析体系中，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形式等经济形态，都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关键中介，是理解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核心切入点。马克思通过对各类中介环节的层层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结构与发展趋势，展现了中介范畴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进一步拓展了中介范畴的适用边界，明确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运动都离不开中间环节的支撑，对立两极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实现相互联结与相互转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无法解释客观世界的复杂联系，只有承认中介的普遍性，才能真正把握事物运动的辩证属性[3]。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中介与联系的关系作出高度概括，强调一切事物都通过中介环节连成一体，中介是普遍联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进一步巩固了中介范畴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基础地位[4]。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中介范畴具备清晰而严谨的内涵规定。中介是事物普遍联系的实现形式，客观世界以普遍联系为基本特征，而多数联系以间接方式存在，中介正是间接联系得以成立的载体。中介是矛盾双方实现转化的必要条件，矛盾的同二性与斗争性均需依托特定中介环节展开，脱离中介的矛盾转化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中介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载体，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均以中介为内在支撑，事物的发展呈现为连续、过渡、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中介同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构成，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必须依靠工具、技术、制度、语言等中介系统实现，中介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

3. 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对话与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中介”范畴，是唯物辩证法把握事物联系、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核心方法论工具，指连接对立双方、推动矛盾转化与历史演进的实践环节与关系载体。它扎根于物质生产实践，贯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既体现事物“亦此亦彼”的联结属性，更承载着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与资本逻辑的现实规定性。将其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同类概念展开比较，既能激活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的当代活力，也能在对话中彰显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底色与独特价值。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与“生活世界殖民化”重构社会中介机制，把语言交往视为社会整合的核心中介，主张以交往理性化解工具理性的异化。其理论突破了传统意识哲学局限，聚焦主体间话语沟通与规范共识，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为理解文化、道德与公共领域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新视角。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性并非高扬主体性为核心的理性”[5]，他将中介根基从物质生产实践转向语言符号，弱化了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回避了资本逻辑对交往关系的结构性支配，使得交往理性的理想性难以触及社会权力的现实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则始终以物质实践为根基，把语言交往置于生产方式的框架中考察，既承认交往的中介功能，更揭示其背后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利益博弈，避免陷入语言唯心主义的抽象化困境。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转译”为核心中介概念，打破人类与非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将技术、器物、制度等非人类实体均视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通过异质行动者的转译与联结形成社会网络。这一理论拓展了中介的外延，呈现了社会技术网络的微观建构过程，为分析复杂社会系统提供了

扁平化、去中心化的分析工具。但“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必须要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认识因素与存在因素、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等这些二分事物”[6]，该理论消解了社会结构的层级性与历史规律性，对资本、权力等宏观支配性力量缺乏批判性反思，将所有行动者视为对称平等的存在，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对网络建构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则坚持历史总体性视角，既承认技术、器物等物质中介的重要作用，又始终将其置于特定生产关系中考察，揭示中介背后的阶级统治与资本增殖逻辑，在微观联结与宏观结构之间建立辩证统一。

与当代社会理论的对话，为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注入了新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启发我们重视文化、话语等精神中介的社会功能，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推动我们关注技术、物的中介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作用，二者共同弥补了传统中介研究对微观互动与非人类要素的忽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的内涵与分析维度。而在比较中，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的独特贡献愈发清晰：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始终坚持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将中介分析与资本批判、权力解剖紧密结合，既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更揭示社会矛盾的阶级本质与历史走向；既吸收当代理论的合理要素，又坚守批判性立场，避免陷入抽象化、去政治化的理论误区。

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数字社会崛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介范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解释力。它既能够借鉴当代社会理论的方法创新，又能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穿透各类中介形式的表象，揭示现代社会的支配关系与异化本质。这种开放对话与坚守立场的统一，让马克思主义中介理论在与当代思潮的碰撞中不断发展，为理解现代社会结构、推进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方法论支撑。

4. 中介范畴的复杂性及其潜在负面效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介”，并非单纯的中性连接工具，而是承载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的复杂范畴。它在推动事物转化、实现社会整合的同时，也因其结构性、制度化特征，蕴含着内在复杂性与潜在负面效应。

中介的首要负面效应，是社会关系的“去直接化”与主体真实联结的消解。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多以直接在场的方式展开，中介环节简单。而现代社会的专业化、技术化发展，使各类社会行动均需经由多层中介完成。哈贝马斯强调的语言交往中介，在媒介化话语体系中脱离原初生活情境，沦为程序化符号操作；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虽拓展了中介广度，却也拉长行动链条，使主体互动愈发间接抽象。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这种去直接化是社会关系物化的表现，商品、资本、技术等主导性中介，将人与人的真实联系遮蔽为物与物的关系，导致社会关系疏离化、碎片化。

中介过度发展的另一风险，是责任模糊化与归因困难。中介环节越多，责任越易被分散、隐匿，个体行为后果难以追溯至具体主体。哈贝马斯警惕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本质上是系统中介对道德责任的侵蚀，法律、市场机制以形式理性取代实践理性，使个体仅对规则负责而非对他人负责。拉图尔的网络理论因对称性原则，淡化责任层级与归属，弱化了对支配性力量的追责可能。而马克思主义明确，责任模糊是统治关系的隐蔽手段，资本逻辑通过多重中介，将剥削转化为“客观规律”，使支配主体隐身，导致责任悬置成为普遍困境。更为深刻的是，异化的中介会转化为新型控制形式，以隐蔽方式规训主体。中介本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脱离工具性地位，成为支配力量——货币异化为财富崇拜对象，技术异化为控制劳动的手段，平台异化为数据规训工具。这些中介看似中立，实则承载资本增殖逻辑。哈贝马斯未揭示工具理性压制背后的资本逻辑，拉图尔回避了中介网络对阶级统治的服务，而马克思主义指出，中介异化是社会结构的必然，当它被纳入资本链条，便会以精细化、智能化方式实现社会调控，其控制具有更强隐蔽性。

综上，中介具有鲜明双面性，既是社会运行的必要联结机制，也可能异化为疏离关系、模糊责任、

实施控制的工具。对其负面效应的分析，需借鉴当代社会理论的洞察，更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将中介问题置于生产方式与资本逻辑框架中把握，为超越物化中介、重建真实社会联结提供理论支撑。

5. 中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地位

中介范畴是唯物辩证法总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理解联系与发展的关键切入点。唯物辩证法将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视为世界的基本属性，而联系的普遍性与发展的过程性均以中介为实现路径。直接联系在客观世界中相对有限，大量关系依靠中介环节得以建立，中介使分散的事物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7]。事物的发展并非直线式跃进，而是由一系列过渡阶段、中间形态、转化条件构成的连续过程，中介使发展具备稳定性、连续性与现实性，避免陷入抽象的突变论。

中介范畴贯穿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内在逻辑。在对立统一规律中，中介承担着联结对立双方、缓和矛盾冲突、推动矛盾转化的重要功能。矛盾双方并非绝对隔绝，而是在中介作用下形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介为矛盾从对抗走向协同提供现实路径。在质量互变规律中，中介体现为度的范围内的渐进积累环节，是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必要条件，事物的飞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长期中介性积累的结果。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中，辩证否定本身就是具有中介性质的活动，既克服旧事物的消极因素，又保留合理成分，推动事物在自我完善中实现螺旋式上升[8]。中介使三大规律形成内在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中介范畴最突出的理论意义，在于实现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彻底超越。形而上学坚持孤立、静止、片面的认识方法，将对立两极视为绝对不可兼容的存在，崇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忽视事物之间的过渡状态与中间环节。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解释客观世界的复杂结构，更难以指导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思维强调对立之中有统一、差异之中有联结、冲突之中有转化，要求在两极之间把握中间状态，在动态过程中理解事物本质[9]。中介思维推动认识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绝对走向相对、从静态走向动态，是科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必要思维工具。

6. 中介范畴的当代呈现与现实场域

随着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与实践方式革新，中介环节呈现出系统化、技术化、制度化的新形态，中介范畴的现实意义不断凸显。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平台、数据、算法等新型中介形态，这些中介重构了劳动方式、交往模式与社会结构，既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也带来中介权力异化、中介责任缺失等新问题。数字中介的广泛普及，使社会关系呈现出高度间接化与符号化的特征，人与人的直接交往逐步被技术中介所替代，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中介化生存状态。

在社会治理领域，制度、规则、组织、程序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的重要中介载体。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本质上是优化中介结构、畅通中介渠道、提升中介效能的过程。合理的中介机制能够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化解潜在矛盾、降低运行成本，而中介机制的缺失或扭曲则会引发治理失灵、信任流失与矛盾激化[10]。新时代社会治理强调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与综合施策，其内在逻辑正是对中介思维的现实运用。

当代社会的矛盾体系呈现出复杂交织、多层联动的特征，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自由与秩序、创新与规范等关系均需依靠中介机制实现动态平衡。简单偏向任何一极，都会导致社会运行失衡与发展偏差。中介思维要求在对立目标之间寻找协调路径，在多元诉求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动态变化中保持整体系统的稳定运行[11]。在个体存在层面，文化、价值、话语、情感等精神中介塑造着人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模式，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意义焦虑、交往疏离与精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精神中介系统失衡所引发的现实问题。

7. 中介范畴的当代价值与方法论启示

中介范畴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与现实问题解决提供双重支撑。在理论层面，系统挖掘中介范畴有助于完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弥补长期以来对过渡环节、中间状态、转化条件研究不足的短板，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说服力与时代引领力。中介范畴使辩证法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实现丰富与发展。

在实践层面，中介思维为化解复杂社会矛盾提供科学路径。新时代面临的各类问题具有关联性、系统性与长期性，依靠简单化、极端化、片面化的方式难以实现有效解决。中介思维强调重视条件、把握过程、统筹兼顾，要求在矛盾两极之间搭建协调机制、沟通平台与转化路径，推动矛盾以温和、有序、可持续的方式得到化解[12]。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还是文化建设，中介思维都能够提供稳定、理性、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中介范畴所蕴含的方法论要求集中体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正视事物之间的中间环节与过渡状态，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其二，坚持动态发展的观点，在运动过程中把握事物本质，重视量变积累与条件建设。其三，坚持系统统筹的观点，协调多方要素、平衡多重目标、兼顾多元利益，实现整体最优。其四，坚持实践导向的观点，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在实践中完善中介机制、优化中介功能、提升中介效能。

8. 结语

中介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的重要体现，是贯穿唯物辩证法、实践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逻辑环节。从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萌芽，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重塑，再到当代社会的现实展开，中介范畴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理论活力与实践生命力。中介并非抽象的逻辑形式，而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事物联系、转化与发展的必要支撑，是破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关键工具。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矛盾关系日趋多元、实践形态日趋丰富的背景下，重新阐释中介范畴的理论内涵、体系地位与现实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思维，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就是坚持联系、发展、全面的认识路线，能够为理解时代发展规律、化解现实社会矛盾、推进新时代实践创新提供坚实的哲学支撑。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5]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6]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7] 张一兵. 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8] 王南湜. 唯物辩证法的当代阐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9] 丰子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思考[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10] 孙伯鍙.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苏晓珍, 余欢.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解码[J]. 秦智, 2025(8): 118-120.
- [12] 陈佳.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机体哲学解读[D]: [博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21.